

【编者按】本栏目由本刊和e线图情 (www.chinalibs.net, www.chinalibs.cn) 合办, 对图书情报领域的知名专家进行特约访谈。受访专家就特定问题的真知灼见将陆续见刊, 以飨读者。本期受访专家为方卿教授,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 新闻出版总署武汉大学高级出版人才培养基地主任, 《出版科学》杂志主编。曾获国务院政府特贴, 入选首批“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研究方向为出版营销管理、数字出版和科学信息交流。

访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方卿教授

刘锦山

(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 100085)

DOI: 10.3772/j.issn.1673—2286.2014.11.012

数字技术的发展对于图书馆行业以及出版业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 传统出版业是图书馆行业的上游产业, 在某种程度上二者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但技术的发展, 使得产业链中上下游的界限日渐模糊, 图书馆也可能成为出版的主体, 出版社也可能承担起图书馆的某些功能。在这种背景下, 图书馆行业与出版行业如何发展与自处? 带着这样的问题e线图情采访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院长方卿教授。

刘锦山: 方院长, 很高兴您能接受e线图情的采访。您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出版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取得了很大的学术成就。请您向读者朋友谈谈您多姿多彩的学术生涯。

方卿: 非常感谢刘总和e线图情对我的关注。我首先向读者朋友简单介绍一下我20多年来的从业情况。我大学本科和研究生, 都是在武汉大学度过的, 专业就是图书馆学。1990年硕士毕业以后留在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出版发行学教研室工作。也就是说, 我学的专业是图书馆学, 工作以后的研究与教学活动却是在出版领域。当然, 这两个学科也是有联系的, 而且, 我学的图书馆学专业对于我从事的出版学教学、科研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工作了几年之后, 又攻读了图书馆学专业的博士学位。

这些年一直在出版营销和数字出版领域从事教学、科研活动。武汉大学出版学专业是从1983年创办的图书发行管理专业演变而来的。我留校以后在出版发行学教研室承担出版市场信息学和出版营销管理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后来我指导的研究生也是图书市场信息研究和出版营销管理研究这两个方向。因此, 我的教学科研与当初学习的图书馆学还是有些关系的。近十年来, 我的研究更多集中在数字出版领域,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与我当初学习图书馆学专业密不可分的。从信息的价值链或者产业链角度来看, 出版、图书情报实际上是一个上下游的关系, 出版机构所生产的出版物是图书情报机构的主要信息来源。上世纪末以来, 信息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的发展, 一方面改变了出版的生产方式甚至包括出版物的形态, 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信息用户的需求, 包括阅读方式等。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我开始将研究的重点从出版营销转向了数字出版。我对数字出版的研究, 虽然有产业管理视角, 但更多的还是图书情报(或曰信息管理)视角, 重点主要涉及开放存取出版和数字出版学术质量控制等问题。

数字出版与传统的纸质出版相比, 在流程、方式等方面都有不一样的地方。数字出版物的学术质量, 在社会上和图情界是遭到一些非议的。三审、三校等传统出版程序在数字出版中没有完全做到, 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数字出版的学术质量。鉴于此, 我在数字出版领域的

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数字出版学术质量控制。在教学方面，我也比较早地在我们传统出版发行学专业下面招收数字出版方向的研究生。2012年我们在全国率先创办了数字出版本科专业，现在这个专业已经列入了教育部的本科专业目录了。2012年该专业正式招生，报考的学生非常踊跃。数字出版专业自从列入本科专业目录以后，两年之内有十几所高校也设立了这个专业，其中包括中南大学、上海理工大学等。这对推进传统出版产业的升级，更好地满足数字信息需求具有积极意义。

刘锦山：方老师，刚才您已经谈到了您20年来的研究、教学方向。起先是出版营销管理，然后是数字出版，数字出版领域您主要关注的是开放存取和数字出版学术质量，还有科学信息交流。请您向读者朋友具体谈谈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方卿：出版营销管理我现在还在坚持做。出版行业由于意识形态属性而导致其管理体制与其他产业领域有所区别，或者说出版领域市场化程度和产业化程度比较低。我主要从市场营销的角度出发，将市场营销的一般基本理论、方法或者技术应用到出版领域。我陆续出版了四五本书，比如1998年山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营销学》，200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营销管理》，2005年广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畅销有理：畅销书案例评析》，2008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营销学教程》等。

数字出版方面关注的时间也比较早，前面我也讲到了数字出版的质量控制问题，这方面也做了几个项目：2010年承担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开放存取数字期刊学术质量评价与控制研究”（70973094），2007年和2010年承担了两个教育部博士点基金项目，项目名称分别是“国内外科技论文网络发表平台的发展现状与问题分析”（20070486108）和“开放存取对学术交流系统的影响机制及对策研究”（20100141110139）。2013年，在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著作《数字出版产业管理》。

科学信息交流实际上是出版学、图书馆学两门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领域。在一定意义上，学术出版是服务科学交流的，而图书馆是科学交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或者机构，我学的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是出版学，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成为我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向——科学交流或者科学信息交流。2005年我在武汉

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科学信息交流研究》这本书。2000年到2003年4月份之间我陆续发表了20多篇与科学信息交流相关的文章。

刘锦山：方老师，您谈到的数字出版质量控制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学术研究过程中作者通过论文发布学术成果时，大家都在引用参考文献，人们一般认为经过传统出版方式出版的学术文献，其可信度和学术价值会更高，而网络文献、数字文献的可信度和学术价值与传统学术出版物相比来得就有些弱。您觉得这方面以后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实际上，通过数字出版这种方式出版的学术文献，或者是通过互联网发布的学术文献，不能说这些文献全部质量不高，有的质量不高，但是也有高质量的；就像正式出版的书刊一样，有些质量很高，有些质量就不行，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因此，数字出版学术文献的深度开发利用方面会不会有所变化？我们应该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和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方卿：正如您刚才所说的，实际上传统出版物的质量也有高低的问题，数字出版也是一样的。经过十几年二十几年的发展，数字出版的学术质量总体上有了明显的提升。在开放存取出版物之中，大家非常熟悉的的就是PLoS（Public Library of Science），即科学公共图书馆，PLoS有十几种子刊，比如说PLoS生物学，即PLoS Biology，它实际上就是一种刊物，它的影响因子已经达到了二十多、三十多，非常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数字学术出版物中其实是有一些学术质量非常高的出版物。当然，也有一些出版物，主要是在早期，尤其在不是很规范的情形之下，特别是一些小的机构搞的一些开放存取出版物，在质量把关方面还做得不够。我国其实也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开放存取平台，一个是科技论文在线，这是教育部的，另一个是奇迹文库。它们的学术质量与传统正式出版物相比应该说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一般学术期刊至少有个同行评审机制作保障，还有一个编委会在那里可以把把关，而新出现的数字出版平台早期不一定有这样的机制。这种情况下，其出版物学术质量整体上应该说比传统的要低一些。但是这些年来，大家在发现这些问题之后，采取了一些措施。一些做得比较大的平台，比如美国的BMC（BioMed Central）、PMC（PubMed Central）、arXiv等，都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来提升数字出版物的质量。arXiv虽然是一个物

理学平台,就是一个学科仓储,通过对作者身份的认证等措施,对发表的东西实际上起到了一种监管的作用,所以它所收录的文献的质量也会有一定的提升。毫无疑问,未来数字出版质量将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一些大的学术平台在质量控制手段上也会逐步强化。从我了解的情况来看,至少可以从下述这几个方面来做些工作:第一,制度建设方面,建立学术质量控制机制,比如,早期的一些开放平台不一定有同行评审的方式,现在不少的平台有了同行评审机制,制度建设方面在强化;第二,流程控制方面,实际上也在逐步改善,早期有很多平台——机构仓储也好,开放存取期刊也好,实际上就是作者自己把文章丢上去就行了,现在实际上也有一个把关的过程,流程也比以前严格了一些;第三,有一些平台还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来控制质量,比如说会对文章的相似性等做一些基本的比对,通过技术手段来提升质量。从未来来看,数字出版的学术质量,我感觉会逐步改善和不断提升。

刘锦山:我国的出版和意识形态是关联的。传统出版需要通过依照相关规定成立的出版机构出版,每本书都有一个书号。就传统出版而言,对于什么是出版或者正式出版,大家都会有一个大致明确的概念。但是数字出版的情况与传统出版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主管部门也给符合条件的一些机构颁发了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有了这个牌照就可以做互联网出版了。但是现实情况是绝大多数的机构或者网站并没有这个牌照,数量众多的网站或者机构也会通过网络或者其他数字载体直接发布信息,例如,为数众多的科研机构网站发布学术动态和科研成果,这种情况算不算互联网出版呢?从狭义上来讲,数字出版可能像传统出版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这个规定是什么?国外对于出版或者数字出版的规定与我们国内有什么区别?一般情况下,人们可能会认为,对于传统出版而言,印出来就是出版;数字出版可能就是通过数字媒介将信息发布出来。如果是这样,现在对于互联网出版或者数字出版的管理应该还处于探索阶段。

方卿:您谈到的情况我感觉可以归纳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出版。实际上,对于什么是出版,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一个公认的定义的,这就是公之于众,把自己或者他人的观点通过一定的手段或者方式发布出来就是出版。

刘锦山:也就是说出版不一定要有书号或者刊号?

方卿:可以这么讲。一般意义上的出版就是公之于众。但是,我们前面谈到,出版毕竟还带有意识形态问题,所以在不同国家对出版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由于管理方式的不同,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官方对于出版的理解和定义是不一样的。我们国家对于出版有严格的定义,即主管部门授权的机构所从事的出版物编辑、复制与发行活动才是真正的出版。我们国家传统意义上的出版机构有三类:一是图书出版机构,就是人们常说的出版社;二是报社,三是期刊社。我们国家的出版社有500多家,报社有2000多家,期刊社或者编辑部大约9000多家。在新媒体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一些新类型的出版机构,比较早的有音像出版机构,我们国家有300多家,早年主要出版卡带或者是光碟;其次还有电子出版社,全国有几百家,当时是由以前的新闻出版署所批的;现在还有互联网出版机构等。

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国家是有数字出版的定义的。在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还没有合并之前,新闻出版总署的科技与数字出版司对于数字出版给了一个工作定义。定义的具体内容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当时我们在这件事上沟通过。这个工作定义是把总署交给科技与数字出版司管理的产业门类定义进来,这个定义相对来说就宽了一些。除了前面说的这些音像出版、电子出版、互联网出版机构被定义进来了之外,网络游戏、动漫、彩铃、网络广告等也被定义进了数字出版这个概念之内。这是我说的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关于数字出版的定义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与我们国家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与很多因素有关,比如说欧美国家和地区对传统出版的定义和我们有很大不同,出版并非需要政府授权。西方国家和我们国家一样,每个出版社都有社号,每本书都有书号,每种刊都有刊号。版号都需要,但管理方式不同。以美国为例,美国对书号的管理实际上是委托一个企业来管理的,即Bowker公司。如果一个组织或自然人要出版一本书,不想让别人出,自己出可不可以?去Bowker公司申请一个书号就可以自己出版了。我们国家台湾地区也一样,台湾地区的书号不是一个政府部门来管理的,而是由台湾地区的“国家”图书馆来管理。个人想出版一本书,在网上就可以向“国家”图书馆提交一个申请表,对方在七个工作日之内必须把条形码和书号发给作者。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给,就是对方的不作为。

因此,就这些国家和地区而言,将出版称之为公之于众是没有问题的。在新的背景之下,数字出版的定义与传统出版一样,也没有那么严格,不是说非要政府正式授权才可以出版的,主要是通过一些载体把内容加工以后发布出去就是出版。可见,数字出版西方国家与我们的定义也有出入。

刘锦山:现在传统出版的管理主要就是通过出版机构的管理来管理的,数字出版如果采取传统管理的方式是不可行的,管不过来。现在是多中心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是一个发布者或者出版者,采取以前的管理方式是没办法管的。

方卿:那是管不了的,只要有一个IP地址,只要有一个基本设备,人人都是主持人,人人都是出版社。现在有一些概念官方并没有认可,比如说自出版。这个概念与西方的自助出版是不同的,自出版就是个人借助某种网络平台从事的类似出版的活动,比如在微博上出版;再如微出版,也就是微内容的发布。这些东西发布后也有很多人传阅,这算不算出版?从本质上来讲,如果把出版定义为公之于众,这也算是出版。当然在一定制度之下,还有个规范问题。数字出版对于出版管理的挑战还是蛮大的,技术发展那么快,影响又那么大,要想封锁它,实际上也没有谁敢,也没有谁想去这样做。主流的想法就是怎么去引导,所以更多的人都在探索和摸索。

刘锦山:如果严格按照有些规定来看,没有获得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机构和个人都不能通过网络或者数字媒体发布信息,但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带来的挑战太大了,政府管理部门也在观察、探索,只要不要超越底线,不违背社会良俗,大家就可以自由地去发展。

方卿:数字出版如果要用传统的方式管理,会是什么后果?所以现在管理部门也在观察、探索,只要不超越底线一般都是允许的。

刘锦山:传统出版好管理之处,是传统出版的成本在那里放着,要印本书,自己去出版还得花钱。现在技术的发展,使得数字出版基本上是没有成本,只要通过手机一按就发布出去了,数字出版的成本很低。

方卿:是这样的。

刘锦山:方老师,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出版业尤其是学术出版的模式、形态和产业链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您刚才谈的开放存取出版业谈到了这个问题。业内人士从不同视域和角度对于出版业的发展趋势作出了自己的预测。您对于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方卿:我在好多地方讲过这些内容,周六我在时代出版集团有个讲座,讲的内容就是出版业的现状、未来和应对。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出版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其实从上个世纪末到今天,我们国家在传统出版业从产值上讲是在增长的,但这个增长更多的是由于定价的增长所造成的,出版行业从实物销售数字上来看实际上是在下滑的。比如说我们国家图书印数最多的年份是在1998年,当时图书的总印数达到了78、79亿册,之后就一直处于下滑状态,到了2000、2001年大约是62、63亿册。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图书销售册数的数据,所以只能用印数来看这个问题。近些年总印数有点回升,达到76、77亿册。这只是印数,实际上印出来的书还有很多没有卖出去,还有库存,我们的库存现在持续上升,2000年总库存就超过了50亿册,在2000年前后大概还是34、35亿册左右,这几年平均每年的库存量增加2亿册左右。印数下降、库存增加,实际销售的数字肯定是在下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出版不采取新的技术、新的方式来应对挑战,出版领域的后果是不可想象的。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尽管传统出版在下滑,但这绝不意味着居民或者公民的文化消费在下降。数字技术的发展造就了数字出版新业态,它提供了一种新的产品或者新的服务方式,满足的也是公民的文化消费,产生的也是文化产品。现在国家也在反复提倡传统出版的转型升级,传统出版业要重视新技术,与新技术融合。但是,我们做得不算好,尤其是传统出版业在应用新的数字技术来转型升级方面做得不好。西方国家在这方面做得比我们好得多。比如在学术出版领域,西方国家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以数据库出版为主。现在一些知名的学术期刊出版纸质版的也不是太多了,大多数都是采取新的技术至少是用数据库出版。语义出版等已经很普遍了。我们国家尽管也有一些类似的平台,实际上还是把纸质文献的内容放到网上去,深加工不够。西方国家现在有一种被称为增强型数字出版,在出版物中嵌入进来很多媒体的内容,比如说文章中提到了一个实验,文中不仅有实验结果,而且把实验过程等所有内容都嵌入进

去了。我们如果能把这样一些东西用起来，对出版产业的提升有很大意义。

这是学术出版这一块。在出版中还有比较大的一块就是教育出版。教育出版现在西方采用的技术和实现的方式走得比我们远得多，做的比我们好得多。现在我们更多的还是在探讨电子书包，西方国家已经走过了电子书包这个阶段，现在做的多是电子校园、电子教师这一类东西。这也可以说是数字技术对出版行业的影响，它的未来从这里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刘锦山：我们国家出版业的发展还是与您前面讲的问题有关联，出版业市场化程度不高。传统出版业实际上处于一种半垄断状态，不少出版社通过书号也能维持生存，这样就没有太大的生存压力，如果市场化程度很高，就会产生严重的危机感，从而促使自己想办法去应对危机。

方老师，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出版业和图书馆行业都属于文化产业的范畴，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传统出版业是图书馆行业上游产业，在某种程度上二者是一种共生的关系。但是技术的发展，使得产业链中上下游的界限日渐模糊，图书馆也可能成为出版的主体，出版社也可能承担起图书馆的角色。您是怎么看待这种相互影响的？

方卿：出版业和图书馆业在文化产业范畴中，是上下游的关系，是一种共存的关系。历史总是有轮回的，从中国的历史来看，古代的刻书机构很多时候与图书馆都是一体的，既是图书馆也从事出版活动，既储藏也出书、卖书，在早期二者至少还没有那么明确的分工。随着社会的发展，专业分工不断深入，藏书功能逐步发展成为图书馆，刻书卖书功能逐步发展成为出版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技术的发展有可能会使这两个机构重新融合在一起，而且这种状况现在已经出现了。很简单的例子就像刚才讲的PLoS——科学公共图书馆，科学公共图书馆既是一个图书馆，但实际上又是一个出版机构。图书馆对新技术比出版社更敏感，已经把新的技术运用到自己开发出版物上了。

学术出版物的初衷实际上是服务学术交流的，而不是经济目的。一六六几年才有期刊出现。但是现阶段因为科技期刊或者学术期刊都被一些大的出版机构或者是商业出版机构垄断了。在这些机构的操纵下，科技

出版物的价格不断上扬，但用户又不能不买。在一定意义上讲，现在商业出版机构的发展不是在促进了而是在阻碍了科学交流。科研项目花了很多钱，后来出了文章，文章登上了期刊上，一份期刊也要卖几千块钱，很多人想看还看不到了，所以阻碍了科学交流。这样，图书馆在资源购买上需要花费更多成本。

现在图书馆通过技术，利用自己拥有的内容，进行加工、组织，自身提供出版服务为什么不行呢？如果图书馆能做到这一点，实际上它就是在履行出版机构的职能嘛！从某种意义上讲，图书馆要尽可能充分利用这些技术，因为图书馆有市场，知道客户的需求，有针对性地从事相关出版活动是有市场和空间的。

换一种角度讲，现在的出版机构包括发行机构在内，是不是也可以承担起一部分为公众提供非付费信息服务的职能呢？现阶段网络出版机构至少有部分出版物也可以给读者先看看的，像亚马逊公司。亚马逊是不是出版机构不好讲，但至少它是发行机构。事实上它也部分地承担了图书馆的一些功能，它网站上有些东西是可以免费看得到的。实体图书销售机构也在向这方面转型，比如说新加坡的唐城书店，那个书店买书的人少，看书的人多，它就是为公众提供阅读服务的。国内也有很多大型的图书超市也在履行这样一种功能。技术发展到了程度之后，图书馆和出版社这两类机构的职能划分可能会慢慢淡化。因此，出版行业应该向我们图书馆来学习。

刘锦山：您刚才谈到的语义出版、增强型数字出版物，可以把一些音频、视频或者知识元等内容嵌入到文本里面，这样对读者来说更方便，对我们进一步完善e线图等产品启发很大。

刘锦山：方老师，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在国内图书情报界一直有很大的影响，请您谈谈您对于贵院未来发展的一些思考。

方卿：说实话，刚开始我对担任院长有一些顾虑，我虽然学的是图书馆学，但是教学、科研一直在出版领域，实际上是在图情这个圈外的，我当时觉得担任院长不一定合适。

上任两年来，我自己的想法也有了些变化。其中有两件事情，对改变我的想法有较大启发。2014年9月，我们邀请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来院

里做讲座。邬书林副局长的讲座不是关于出版方面的，而是信息流程，他把出版看作是整个信息流程中的一个环节。邬书林局长认为，有出版业的研究经历对于做好信息管理学院工作会有积极的帮助。这对我鼓励很大。另外，我们到西方国家一些信息管理学院访问时了解的情况，也验证了我的一个想法——图书情报不是一个孤立的领域，而是与出版密切相关的。美国的UIUC——伊利诺伊香槟分校，其图书情报学在美国排行第一，而数字出版也在美国名列前茅。我们去的时候，他们的一位副院长刚在*Nature*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数字出版的文章。通过这两件事情，我感觉出版领域的教学、研究经历对于做好信息管理学院的工作可能还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条件。

信息管理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学科，我担任院长以来感觉社会对这样一个学科的认知程度还是蛮高的。如

果说我们是图书情报学，那么公众的认知就相应窄了；如果说我们是信息管理，那么公众的认知度就非常高。大家感觉到我们信息管理学院培养的人才在社会上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很多领域其实都需要我们这个领域的人才，不仅文化领域需要，政府部门在信息采集、组织和服务方面也需要，我们的人才对行政或者政府部门管理工作的意义很大；同样，产业界也存在着信息资源管理的问题，我们的学生到企业里面去也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信息资源的价值被大家充分认知的背景之下，我们的学科有非常好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也真心地希望有更多人关注或者是关心我们学科的发展。我自己是研究出版的，学校任命我担任信息管理学院的院长，希望能把学院和学科的发展面拓宽一点，不限于图书情报领域，要把信息管理做实了，出版要向前扩充一步，进一步拓宽研究领域或者范畴。

作者简介

刘锦山，男，1969年生，博士，北京雷速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E-mail: ljs@leisun.net。

(收稿日期: 2014-11-04)

■ 书 讯 ■

《中国高被引分析报告2012》

在您所关注的研究领域，哪些论文最受同行关注？哪些研究主题最为热门？哪些学者最具学术影响力？哪些期刊最获同行认可？又有哪些机构占据领域研究的制高点？上述问题请您参考近期出版的《中国高被引分析报告2012》。

该书将理、工、农、医、人文、社科等领域划分为51个学科，综合分析了各个学科的研究热点与前沿、高影响力论文、高影响力作者、高影响力期刊和高影响力科研机构，并以关联图谱的方式展现各种学术关系，有助于科研人员及时发现并跟踪研究热点，可为科研管理机构评估科研能力提供依据，还有利于期刊编辑部监测本刊学术影响力，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期刊编辑部等相关单位和人员参考工具书。

该书以“中国知识链接数据库”为依托，数据样本覆盖我国6000余种期刊的论文及引文，分学科揭示高影响力的学者、研究机构（大学、研究所、医院等）、地区（省/自治区/直辖市）、学术期刊、图书、外文期刊和会议录，并采用共词分析、共被引分析和合著分析等方法绘制出各学科的前沿主题分布以及作者、机构和期刊间关联的知识图谱。

《中国高被引分析报告2012》由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编著，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出版，全书86万字，定价298.00元。